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马克思与 黑格尔的对话

Marx's Discourse with Hegel

[美] 诺曼·莱文 (Norman Levine) 著

周阳 常佩瑶 吴剑锋 任广璐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马克思与 黑格尔的对话

Marx's Discourse with Hegel

[美] 诺曼·莱文 (Norman Levine) 著

周阳 常佩瑶 吴剑锋 任广璐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 (美) 莱文著; 周阳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6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1辑)

ISBN 978-7-300-21448-1

I. ①马… II. ①莱…②周…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②黑格尔, G. W. F. (1770~1831)—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A81②B516. 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5197 号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

[美] 诺曼·莱文 (Norman Levine) 著

周阳 常佩瑶 吴剑锋 任广璐 译

Makesi yu Heige'er de Duihua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7 插页 1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2 000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上一本书是献给我所有子女的，当前这本就该献给我的所有孙子、孙女了：

本杰明·阿里 (Benjamin Ari)、阿伦 (Aaron)、本杰明·马克斯 (Benjamin Max)、麦迪逊 (Madison)、萨拉 (Sarah)、埃玛 (Emma)、丽贝卡·路易莎 (Rebecca Louisa)、艾丹 (Aidan)、雷切尔 (Rachel)、梅根 (Meghan)、凯蒂 (Katie)、迈克尔 (Michael)、卡西迪 (Cassidy)。

希望孩子们能循着他们父辈的足迹，再创未来。

致 谢



我要向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艾恩伍德（Ironwood）公共图书馆表达我的谢意，在我创作这本书的六年时间里，它为我提供了一处宁静的港湾。这座图书馆所提供的安静、私密和包容的工作环境是我完成这部手稿的前提条件。

我还要感谢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的朴雅卡·吉本斯（Priyanka Gibbons）和理查德·鲍曼（Richard Bouwman）。我的书得朴雅卡·吉本斯青睐，实在是荣幸之至。理查德·鲍曼则是一位不知疲倦、完美无缺的编辑，《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一书得以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正是靠了他 X 射线般锐利的编辑眼光。作为拥有最终解释权的作者，对本书错漏之处，我将负全部责任。

还要感谢罗丝（Rose），她一直是我灵感的来源。

诺曼·莱文
2011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章	纲要性附论·····	1
第二章	马克思的不完整的探索·····	46
第三章	马克思所知道的黑格尔的著作·····	100
第一节	居于中派的黑格尔与马克思·····	100
第二节	1837 年的信和博士论文·····	139
第三节	马克思与《莱茵报》·····	176
第四节	马克思对批判的发展及其与黑格尔的分离·····	220
第五节	《精神现象学》与资产阶级的颠倒的世界·····	248
第六节	保卫黑格尔·····	287
第四章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误读·····	356
第五章	马克思的方法·····	381
参考文献	·····	401
索 引	·····	414
译后记	·····	421

第一章 纲要性附论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这本书的初衷是描述从 1836 年至 1883 年马克思对乔·威·弗·黑格尔的解读，既包括继承的方面，又包括断裂的方面。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其他作品分析过马克思整个一生中对黑格尔的解读。

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是它已意识到黑格尔的文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1）“可见的文献”部分，即在马克思生前所出版的那些黑格尔的手稿，它们是马克思生前可以获得的，不论马克思有没有读过这些手稿；（2）“不可见的文献”部分，即那些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不存在的黑格尔手稿，它们中的大多数在 20 世纪以后才逐渐发表出来。换句话讲，有相当一部分黑格尔的文献对马克思来说是空白的。

我开始《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的创作起初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我能够解读出包括“可见的文献”与“不可见的文献”对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解读两部分藏书的方法有所不同：由于马克思阅读过大部分的“可见的文献”，对于这部分文献的分析就是利用原文进行诠释，而对于那些“不可见的文献”的解读就是推测性的。既然马克思对“不



可见的文献”全然不知，就只能去推测这些著作可能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尽管这种推断的方法具有主体性，但我仍坚持认为这些关于“不可见的文献”的知识对于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读非常重要，其原因有两个：（1）马克思理解黑格尔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不知道的黑格尔的思想决定的；（2）20世纪对黑格尔研究的复兴，总的来说是因为受到了黑格尔的那些“不可见的文献”的出版的促进，通过出版黑格尔的文本——这些文本修正了19世纪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解释，并且这些文本表现出这样一个哲学家，即他关心那些同样吸引着马克思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革命性地改变了之前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评价。这个“不可见的黑格尔”在某个领域建立了一个“兴趣的共同体”，而不是得出一些必然的结论，正是这些共同的兴趣将黑格尔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

- ② 马克思研究事业除了得益于20世纪才出版的“不可见的文献”，还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2）的出版。^[1]“不可见的马克思”的文献也被揭示出来，特别是那些记录了马克思勾画《资本论》的结构体系的笔记本、马克思的那些准备材料以及《资本论》（第1卷）的最终草稿的手稿都得以为世人所知。尤其是在《资本论》（第1卷）的早期纲要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论的借用，即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方法论范畴的吸收变得更为明显。除此之外，MEGA2还出版了青年马克思在1836—1848年的手稿、摘录和书信，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本书所关注的内容。

MEGA2的出版也使得马克思的两个原本存在的文本被取消了，即之前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两部著作。我有必要对这两部著作的取消做出说明，因为在本书其余部分中我将不再使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书名，而改用“手稿”，并且也不再使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书名而改用“莱比锡宗教会议”。

主张不再将“手稿”视为一部专著主要是基于尤根·罗扬（Jürgen Rojahn）的工作，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2]从事MEGA2的编纂工作。罗扬运用大量文献学技巧证明了“手稿”并不是一个有着共同主题、联系紧密的文本，而是马克思的一些分散的草稿、笔记、评论和个人练习的汇编，之后由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jasza-

nov) 将这些材料进行拼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手稿。本书后面的部分和章节将提供更为详细的关于“手稿”的文献考据学解释。但是在这里我想提醒读者的是：虽然我认同罗扬关于“手稿”的大多数章节应拆分这个观点，但我本人主张将手稿中标题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我认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展现出完全独立且连续的主题，既不模糊也不矛盾，由此成为一部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I. 费尔巴哈”章和“莱比锡宗教会议”，它首次出版于1932年，刊登在V. V. 阿多拉茨基(V. V. Adoratskij)主编的MEGA1中。关于“I. 费尔巴哈”这章，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和英格·陶伯特/汉斯·佩尔格(Inge Taubert/Hans Pelger)^[3]最近的研究证明，“I. 费尔巴哈”从未存在过。它绝对不是一个连贯的文本，而是梁赞诺夫将马克思所做的一些分散的评论以及页边空白处所作的笔记拼接成的单独的一章。因此，“I. 费尔巴哈”的消失不会影响到“莱比锡宗教会议”。《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不是一个哲学探索，它不试图参与“I. 费尔巴哈”或是“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解构，并且，完整的“莱比锡宗教会议”的MEGA2还未出版。因此，我并不打算进行文献学上的争论，并且在本书中，为了以“莱比锡宗教会议”为题进行讨论，我将把标题为“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这两部分包括进去。尽管阿多拉茨基从一开始就已将“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两部分一起纳入“莱比锡宗教会议”中，而我也认为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确实展现出共同的哲学目的，可以被视作传递着共同信息，因此在本书剩余部分中我将把这一专著等同于“莱比锡宗教会议”。³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联系要从可见与不可见的文献中去探寻，正因如此，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必然要从MEGA2之前和之后的参考文献框架中去认识。MEGA2开辟了解读马克思的新纪元，而这也是重估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新纪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将从档案的角度，将“可见的黑格尔文献”与如今在MEGA2中揭示出的“可见的马克思文献”进行比较。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的出版不只改变了之前对两人学术联系的解读，也为我提供了过于丰富的重要资料来源。尽管我对于可以拥有如此丰富的材料感到满意，但显然我很难令人满意地在一本书中将两人



1836—1883 年的大量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文献进行比较。为了对两人的学术联系做出令人满意的最深层次的探究，我有必要将研究的时间段限定于 1836—1848 年，这既是一个可以把握的时间段，也是当前文本研究的时间界限。我将不讨论《共产党宣言》，因为它不能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即本书关注的中心——提供任何参考，并且它主要是马克思投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一个序幕，而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在其 1850—1883 年这段时间的主要关注点。1849 年是马克思学术发展的真空，因为他在这段时间正从比利时迁往伦敦。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不打算深入考察黑格尔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本书不研究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伊曼努尔·康德、约翰·费希特、巴鲁赫·斯宾诺莎或弗里德里希·谢林对黑格尔思想形成的影响，也不研究他的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可能性，或者说它作为逻辑工具的合法性。本书既不致力于罗列卡尔·罗生克兰茨（Karl Rosenkranz）—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奥托·波格勒（Otto Pöggeler）—路德维希·希普（Ludwig Siep）—克里斯托弗·亚莫（Christoph Jamme）—H. S. 哈里斯（H. S. Harris）—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迪特·海因里希（Dieter Heinrich）这些学者对黑格尔的解读史，也不试图去描绘黑格尔为他之后的欧洲与美国的哲学打上的印记。本书不致力于探寻黑格尔学术的内在演进过程，以说明《耶拿笔记》（*Jenaer Notebooks*）中的青年黑格尔与《法哲学》中的成熟的黑格尔之间的断裂。

本书既不准备书写黑格尔的全部著作的发掘和出版史，也不打算介绍或详细说明黑格尔的手稿如何以及何时被发现和付印的。本书也不提供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学的解释。然而，既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要详细考察 1836—1848 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读，我会标明在此时间期限内马克思能够看到的黑格尔的著作或不可能看到的黑格尔的著作。如果不清楚在 1836—1848 年这段时间内马克思在黑格尔全部文献中能获得哪些或不能获得哪些，那么想要对马克思对黑格尔解读的历史做一个完整的说明是不可能的。

4 对于那些对青年黑格尔作品出版年表感兴趣的人，我建议他们去看吉赛拉·许勒尔的文章《黑格尔早期著作年表》^[4]。

我的工作目的是重建马克思对“柏林的巴门尼德”的解读。我之所以把“柏林的巴门尼德”作为黑格尔的同义词来使用，是因为黑格尔认为巴门尼德是第一个发现“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5]的哲学家，并且黑格尔将这一概念借用过来作为他自己的哲学的基本原则。另一个我将作为黑格尔同义词使用的是“老师”（The Master）。我将这个词作为黑格尔的同义词是借用马克思的概念，因为马克思在他的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博士论文^[6]中把黑格尔称作“老师”。我在下文中将对黑格尔的著作做一个摘要，并把这个摘要作为马克思所描绘的黑格尔形象的背景资料。

当代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哲学讨论分为两个阵营：继承派和断裂派。继承派的支持者们看到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尽管并非在所有领域；断裂派的支持者，如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则坚持认为两人之间存在着断裂。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空白，并且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很多方面都进行了错误的解读，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仍属于继承派，并证明这一论点：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并且最重要的是继承了他的方法论工具。我最近写的书《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就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史》和可以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7]中找到的他对黑格尔的这部著作的解读。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1）他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1836年至1848年；（2）他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1850年至1883年他去世之前。只有这样划分才能描绘出这两个时期的差别，并且我推荐读者参考我在《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这本书中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更深入的分析。^[8]然而，我希望能告知读者《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两本书的观点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中，黑格尔是被作为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9]但是，在对黑格尔的政治学进行了更持续深入的研究后，以及在K.-H. 伊尔亭（K.-H. Ilting）关于黑格尔的政治理论研究工作的帮助之下，我改变了我的这一观点。“老师”是作为一个具有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与卡尔·奥古斯



特·哈登堡 (Karl August Hardenberg) 传统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呈现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中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期间，他首次吸收黑格尔在那些年中所出版的作品。他第一次对黑格尔的借用是从 1836 年到 1848 年，在这 12 年中，1836—1844 年这段时间最为重要。在这几年里，马克思于 1841 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3 年创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同年还创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后在 1844 年创作了一部手稿，其中包含题目为“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的子文章，在马克思创作这些作品时，他深入研究了当时已出版的黑格尔的著作。马克思在《神圣家族》(1845)、“莱比锡宗教会议”(1845—1846)和《哲学的贫困》⁵ (1847) 这三部著作中继续对黑格尔的哲学发表评论，但这些评论都是对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思想的思考、运用和批评，而不再是一种原发 (initial) 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主要是关于黑格尔的劳动理论和异化理论。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次借用，亦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吸收和消化阶段，于马克思离开比利时去往伦敦定居期间的 1849 年结束，因为在此期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经历了一次转变。

本书主要讨论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期间。然而，尽管 1836—1844 年这段时间非常重要，但我还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学术兴趣在 1843 年 10 月经历了一次转变，即向政治经济学转变。1843 年 10 月马克思前往巴黎参加了德国工人运动的会议，与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讨论了经济学和黑格尔，同时也开始将他的学术重心从哲学转向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关于马克思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传统解释往往将其与他在 1844 年初阅读詹姆斯·穆勒 (James Mill)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联系在一起。我打算修正这一传统的解释，我认为马克思阅读穆勒的作品之前就阅读过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的著作。马克思在 1843 年阅读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而我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恩格斯在他为《资本论》第 2 卷所写的“序言”中做过如下声明：“1843 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

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10]另外，直至1843年底，马克思一直在研究自由贸易的问题，这也初步标志着他投身于经济学研究。在他的那篇关键性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评了保护性关税。这篇文章写于1843年底到1844年初，并且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还批评了李斯特。^[11]最后一个依据是，马克思在1859年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自己证实了他是在1842年至1843年第一次转向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自由贸易和保护性关税的争论的研究。在那篇“序言”中，马克思写道：“……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2]因为李斯特的书中持保护主义的观点，我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证明了他于1842年至1843年为《莱茵报》撰稿期间阅读过李斯特的书。关于马克思了解李斯特的时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证明了马克思在1843年底前就读过李斯特的书。因此，在确定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缘由问题上，我将最初的动因归功于李斯特。

“手稿”是零散的探索和个人练习，是马克思关于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特别是劳动理论与异化理论）与斯密的《国富论》以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的一种初步的思考。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是从1848年到1883年，这次借用他由对黑格尔的吸收转向了对黑格尔的运用。

从1848年开始，马克思把他的所有精力都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开启了他走向《资本论》这部巨著的旅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⁶写作具体方案形成之时，即在他所开创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之时，他都将黑格尔的逻辑体系作为框架，运用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定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主要是关于对黑格尔方法论的运用。

将马克思描绘成一个专职研究黑格尔的专家是错误的。他没有将他的人生全部投入对“柏林的巴门尼德”的研究中。如果这样评价马克思对黑格尔所做的解读，即将它作为一个职业学术专家的学术成果，而这个专家的整个事业就是为准确地呈现他所研究的哲学家，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马克思对黑格尔产生兴趣，不但是因为黑格尔去世之后其哲



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还因为马克思接触到了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甘斯不仅是黑格尔的密友、“逝者友人协会”（The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Deceased）的成员，并且还曾担任一个在黑格尔批准及资助下由甘斯协助出版的杂志的编辑。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上学期间，选修了甘斯的两门课程：1836—1837 学年的“刑法”课程和 1838 年夏季的“普鲁士邦法”课程。并且，作为一名柏林大学的学生，马克思也进入了黑格尔的世界，起初是作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而“博士俱乐部”是一个崇拜黑格尔的团体，成员们聚在一起边喝啤酒边讨论哲学问题。而后，马克思成为黑格尔左翼运动的成员，其成员还包括鲍威尔、阿诺德·卢格和费尔巴哈，他参加这一运动的时间是从 1841 年到 1843 年。从马克思所读过的黑格尔的著作来看，马克思确实获得了深奥的知识，这是就“柏林的巴门尼德”时代可以获得的黑格尔的著作来说的，但是从 1843 年底开始，马克思的兴趣就转向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并未终其一生去研究黑格尔的著作，但在他年轻时从“可见的黑格尔文献”中所获得的知识，却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建立提供了稳固的根基。

马克思所获取的黑格尔哲学思想图景与他所能接触到的黑格尔作品有直接关系。马克思在其脑海中绘制出的黑格尔思想图景有三个来源：（1）“可见的黑格尔文献”；（2）卢格、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3）在马克思所生活的 1836 年至 1848 年流行的那些解读黑格尔的学派。

根据“可见的黑格尔文献”的目录，即黑格尔手稿的第一版——《黑格尔全集》，在 1832 年至 1845 年出版。自黑格尔去世开始，《黑格尔全集》就成为由黑格尔的同事们所组成的一个名为“逝者友人协会”的组织所负责的一个联合项目，而甘斯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黑格尔全集》历时 13 年才完成，因为其中几卷收录了黑格尔的演讲笔记，而搜集和整理这些演讲材料是一项极为艰难和耗时的任务。卡尔·路德维希·米希勒（Karl Ludwig Michelet）是黑格尔的《哲学史》和《自然哲学》的编纂者，而甘斯则是《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主编。黑格尔的一些最为重要的著作都已经在其生前以独立版本的形式出版了，但是 1832 年至 1845 年的《黑格尔全集》是当时已知的黑格尔的所有文献资料的首次汇集。

《黑格尔全集》的出版不是马克思了解黑格尔的著作和文章的唯一途径。《精神现象学》(1807)、《哲学全书》(1817)、《逻辑学》(首次分三个部分出版, 1812、1813 和 1816) 和《法哲学》(1820) 这些著作的单行本, 对于马克思来说全部都是能够获得的, 并且在本书后面的部分将会说明, 这些书的一部分还曾保存在马克思的私人藏书⁷中。

除了“可见的黑格尔文献”以外, 还存在着一份“不可见的黑格尔文献”, 那就是黑格尔自 1788 年参加图宾根神学院入学考试开始到 1807 年《精神现象学》出版期间所留下的手稿。在谢林的帮助下, 黑格尔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学术职务, 从 1801 年直到 1807 年《精神现象学》出版, 他一直在耶拿大学担任此职务。在耶拿时期, 黑格尔撰写了今天人们所说的《耶拿手稿》(*Jenaer Outline*), 这些文献是“不可见的黑格尔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它预示着黑格尔体系的开创。还有一个重要的例外, 即除了黑格尔在《哲学评论杂志》(*The Critical Journal of Philosophy*) 中发表的文章以外, “不可见的黑格尔文献”都是由 1807 年之前所写材料组成, 而“可见的黑格尔文献”都是由 1807 年之后所写材料组成。

20 世纪见证了《耶拿手稿》的出版, 对于马克思来说, 这属于“不可见的黑格尔”。《耶拿手稿》的出版使得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重新评价如火山喷发般涌现出来, 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The Young Hegel*) 就是其中之一, 这证明了这些关于耶拿的材料如何迫使人们对如何评价黑格尔进行全新的审视。

为了便于明确界定马克思所获得的黑格尔的知识, 我将黑格尔的文献分为 1807 年之前和 1807 年之后两个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研究开始于《精神现象学》, 因此马克思所熟悉的是 1807 年之后这一时期的“可见的黑格尔文献”, 即黑格尔事业成熟时期的文献。关键在于, 马克思所认识的是那个成熟的黑格尔。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了解开始于《精神现象学》, 但我仍要着重指出一点, 即 1844 年的“手稿”并不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到《精神现象学》这本书的地方, 马克思首次提到黑格尔的这部著作是在 1843 年 3 月 13 日他写给卢格的信中。在那封信中, 马克思批评了鲍威尔提到《精神现象学》中的某一章时, 将它作为“幸福意识”的这种方式。这章的完整标题是“自我意识的自由; 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的意识”。在马克思写作“手稿”的一年前, 《精神



现象学》就已经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了。

1807 年之前的阶段与 1807 年之后的阶段这个概念上的划分为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读提供了便利。青年黑格尔为马克思所遗失，他对黑格尔从斯图加特、图宾根、伯尔尼和法兰克福到耶拿的学术轨迹一无所知，这段空白一直延伸到黑格尔极为重要的《耶拿手稿》。

从 1836 年到 1844 年的约十年间，马克思展开了他与黑格尔的深入对话。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完全被割裂了。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是在他与成熟的黑格尔之间进行的。

尽管《哲学评论杂志》出版于 1807 年之前，但我仍将它归入“可见的黑格尔文献”中，因为它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可见的。这本杂志是黑格尔与谢林合编的，尽管黑格尔没有在他为杂志所写的文章上署名；这一阶段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可见的，而且马克思清楚，如果他想看这些材料，他就有办法获取。黑格尔在《哲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 6 篇文章是：

- 1) 《论哲学批判的本质》；
- 2) 《普通人类知性如何看待哲学》；
- 3) 《怀疑论与哲学的关系》；
- 4) 《信仰与知识》；
- 5) 《论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
- 6) 《论自然法哲学与哲学的关系一般》^①。

《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这篇文章是以独立专著形式发表的。

以上提到的 7 篇文章中，有 6 篇被收录进《黑格尔全集》，其中被收入全集重新发表的 6 篇文章是：

- 1) 《信仰与知识》；
- 2) 《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
- 3) 《论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
- 4) 《论哲学批判的本质》；
- 5) 《普通人类知性如何看待哲学》；
- 6) 《怀疑论与哲学的关系》^[13]。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当为《论自然哲学与哲学的关系一般》。——译者注